书信里的梅兰芳与“梅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梅澜芳华——梅兰芳艺术人生展》展示了多封书信，其中有梅兰芳写给别人的，也有别人写给梅兰芳的。这些信贯穿梅兰芳生活的多个阶段，是他生活的绝好注脚。

家书

展览中出现的第一封信是梅兰芳写给祖母的。从信中内容看，大致是梅兰芳民国二年（1913年）初次到上海演出期间所写。信中提到的许老板应是这封信后展出的梅兰芳与丹桂第一台洽记公司合同中丹桂总经理许少卿。

写信时，梅兰芳已到沪一段时间。信中首先解释，没有按期回京根本原因是演出火了，需要加演。信中说许老板再三挽留，但我并不答应，又因各处说情者太多，才“少为变通”，加演十日，到期绝不再续。这个过程演员要端一端，演出方也要给足演员面子，说出去既抬高演员身价，也让外界感觉必须抓住机会，不赶紧买票就可能听不到，实在是高明的营销。

演出“声名甚佳”，“为将来扬名起见”也是要加演的。当然此次赴沪收入颇丰，信中特别说明“包银已加”。根据合同梅兰芳包银是每月大洋1800元，加演之后收入自然也是要加的。

民国二年，梅兰芳年19岁，初红，前一年他已和谭大老板（谭鑫培）合作演出，再前一年北京伶界评选中，梅兰芳为探花。少年成名，在上海走红，角儿的姿态，商业运作，对更大名望的期待，都可从这封短短的信中读到。上海观众对梅的追捧，及至梅兰芳选择上海作为多年生活之地，也在这时埋下伏笔。

梅兰芳与丹桂舞台的合同是一份非常好的民国初年合同范本。合同特别重视“中人”，中人和合同双方同等重要，合同内容都由三方讨论。合同中所有人名下，还有花押，合同日期均阴阳历合写，合同特殊版印格式及合同前面“大吉大利”字样，均提示观者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新与旧在不断冲突、交融。少年成名的梅兰芳也在不断继承和创新，这个过程中嗣后“梅党”（梅兰芳周围的超级粉丝、智囊团等统称）中各位也要登场了。

社交

展览展出的书信中，有些是与“梅党”中人的书信往还。

冯耿光，即“冯六爷”，中国银行总裁，“梅党”核心。梅兰芳在冯耿光家大桌子上排演《天女散花》是艺坛佳话。他对梅兰芳资助甚多，也总在帮助梅兰芳解决问题。展出中有一封冯耿光给梅兰芳的信，内容是梅兰芳赴广东演出的种种事务。信中他为梅找在广东处理文字工作的人，但涉及到两个人，不用哪个人情上都有问题。怕梅为难，冯特别说，如不好处理，最好两人都用，在费用上冯也可代为负担。另外则说到，广东演出第一日不要唱《宇宙锋》，广东人心理上对“疯”有排斥，另外所有剧情都要有粤语介绍。因冯耿光是广东人，对广东人习惯特别了解。一封书信冯对梅的关切和细心即一目了然。

梅对冯也很信任，在给齐如山（剧作家、戏曲理论家）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戒指在家里保险箱中，钥匙带到上海去了，建议另刻一枚图章（或许戒指纹饰是梅的图章），该怎么办请齐如山与六爷商量。

齐如山则用他的细致帮助梅料理演出和日常事物。另一封信中，梅询问齐如山为什么《美人计》的剧装还没收到，又感谢齐帮忙写信。如果没有齐如山协助，或许梅兰芳出国访问也不会这么顺利。展览陈列的齐如山著《梅兰芳游美记》，详细介绍了他为梅兰芳访美事无巨细的准备。如组织编纂《梅兰芳歌曲谱》，为使外国观众更好理解，将梅兰芳各种舞台造型绘制成中英双语的图谱，还包括服装图谱。梅兰芳访苏前，他撰写介绍梅兰芳艺术的《梅兰芳艺术一斑》，将梅的各种指法拍摄成照片。

说到出国演出，胡适为此给梅兰芳的一封信也很有趣。梅兰芳1935年赴苏联演出访问前，胡适介绍戏剧教育家余上沅随行。余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通西文，当时人在天津，有赴欧洲考察戏剧的计划。只是余供职的戏剧机构没有这笔经费，这才劳胡适介绍。后来余上沅也随梅赴苏联，并到西欧考察。

展览中梅兰芳访美、访苏前后在上海举行欢送、欢迎会，请柬也是难得的资料。其中看得出时人对梅出国特别重视，更根本的是对中国艺术能为外国人关注的渴望。几份请柬的订立者，有民国政府要员宋子文、孔祥熙，也有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老一辈政治人物李煜瀛、顾维钧，文化界名人蔡元培、胡适，金融界的贝祖诒、徐新六，以及“海上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可见梅兰芳社交范围之广。

同行

王瑶卿，京剧界“通天教主”，与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有师生之谊。展览中有一封王瑶卿给梅兰芳的信，内容是听冯六爷等说梅闹眼病，特写信问候。

这种周到、委婉也在梅兰芳与四大名旦另几位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如尚小云给梅兰芳写信，先说九年未通音信（有抗日战争因素），介绍自己开设科班和子女学戏情况，听说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也开始学戏，表示很欣慰。然后话锋一转，提到上海有人对他不满意，梅兰芳替他解释，“一百廿分的保障”，事情已有人写信告知，非常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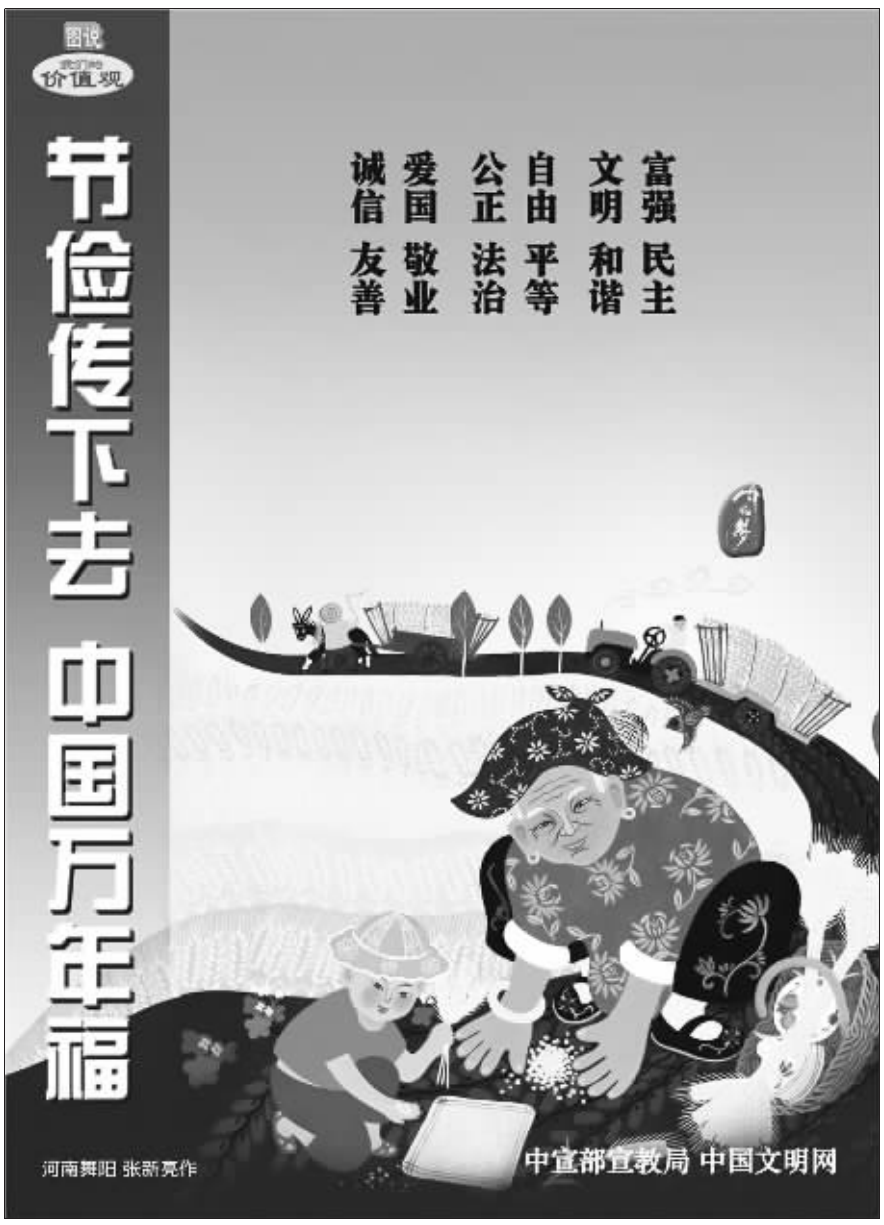
梅兰芳给程砚秋的一封信，则是有罗先生（应是粤籍名士罗瘿公）与人打笔墨官司，大概是梅与程艺术比较之类。冯耿光劝了罗先生，才停止笔墨之争，这再次看出冯对梅的作用。梅随后说我同你亲兄弟一样，别人不得离间。另一封程给梅的信中，程持弟子礼，言到自己还在受累，比不得梅享清福，常有望尘莫及之感。

展览所选梅兰芳和荀慧生间的信，是1949年后的书函往来。荀向梅解释在东北演出时剧团在当地招录几名演员，之后几人离团原因、经过。从信中看，估计前情是离团演员对荀有意见反映到梅处。荀对梅的称呼是“梅院长”，应是梅1957年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后的事情，梅或许因身份关系予以过问。

展览还有几封地方戏演员给梅院长的信，粤剧演员白驹荣、薛觉先希望要中央戏曲研究院的训练计划、训练课程资料，山东五音剧团的“鲜樱桃”希望梅能帮助剧团到北京汇报演出，汉剧团的陈伯华进京演出希望梅能支持。

在戏剧家言简斋的信中，则是梅兰芳能否参加南斯拉夫代表团外事活动和中国艺术家声援匈牙利及纪念十月革命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成了梅院长，身份、社会地位转换，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同了。

据《北京青年报》 辛酉生/文



马三立愤怒也很“哏儿”

天津人的“哏儿”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困难、挫折甚至是在天灾人祸面前，都能用幽默的方式进行排解。“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这句天津人挂在嘴边的话，充分说明“哏儿”是以胸怀、境界为基础的。

马三立就是天津人“哏儿”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之后，落实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马三立进了“咨询委员会”，享受终身不退休待遇。那时有一条规定，“高知”可以在干部俱乐部看内部电影，实际上就是还未公映的外国片。

有一天，他到团里上班，碰见一个后勤人员向他要票，该人在马三立蹲“牛棚”时曾打过他一记耳光，为什么呢？马三立为锻炼身体练“磕牙”，他竟然诬蔑他“咬牙切齿”。之后，马老从未和他计较，见面仍然以“师傅”称呼他。

这次他要票，马老问：“要什么票？”

没想到，这个人对马三立连讽刺带挖苦，说：“你现在行啦！还经常看不花钱的内部电影，你要看腻了，给我也来张票，开开眼。”

“开眼？你要看什么电影？”“就是那外国的，光屁股的。”

马三立很愤怒，说：“光屁股的？没有！”那人不信，说：“糊弄谁呀！”

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动过怒的马三立说：“好！想看光屁股的，给你！”马三立随手掏出一张票，然后还前后看看有人没人，偷偷塞到他手里，说：“悄悄进干部俱乐部，一直走，然后……”

“我懂，别看我不认识字儿，一亮票，人家就告诉我该进哪个门啦！”

“好！好！”

第二天，马三立一上班，看见要票的那个人在传达室正运气呢，便迎着他问：“怎么样？去了吗？”“去了！”“看见光屁股的了吧？”“能不光着吗？你给了我一张澡票！”把周围的人乐得全蹲地上了。

据《老年生活报》 孙福海/文